



中国近代社会
思潮研究丛书

觉醒与迷误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唐文权 著

在近代中国，此去彼来、交替兴起的各种思潮中，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联系最为密切的，即是民族主义思潮。可以说，许多风采照人的历史人物由它作育造化而闻名，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因它酝酿陶铸而发生，而多姿多态的思想文化领域也随处有它的呼号、呐喊，使无数中华儿女沐浴泳翔其间，共兴重振中华之心。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几乎就是爱国主义的孪生姐妹。



——题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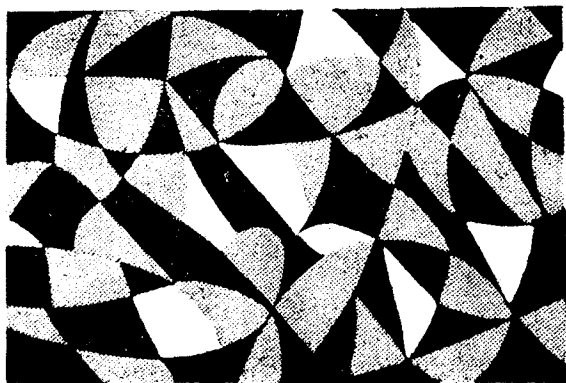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觉醒与迷误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唐文权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高志仁
封面装帧 任 意

觉醒与迷误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唐文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5 字数 232,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18-01672-0/B·202

定价 10.80元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冯 契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鉴平 刘志琴 何兆武

张利民 胡伟希* 高志仁*

高瑞泉*

[有*号者为编委会常务联系人]

目 录

绪论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	---

——顺应世界大潮的东方激流

第一章 传统民族主义的衰落.....	13
--------------------	----

第一节 以不变应万变：深闭固拒的守旧派.....	13
第二节 倡师夷谋制夷：寻求自强的革新者.....	29
第三节 奉天讨胡与扶清灭洋：狂热激愤的起义者.....	37
第四节 以群为体与以变为用：保国御侮的维新派.....	50

第二章 新旧民族主义的交替.....	65
--------------------	----

第一节 姗姗来迟的觉悟：因时而化的清末新政.....	65
第二节 汹涌高涨的怒涛：得时而胜的排满风潮.....	76
第三节 脉脉温情的劝导：失时而挫的改良运动.....	90

第三章 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	103
---------------------	-----

第一节 何溯何从：弃旧图新的国民党人.....	103
第二节 击楫中流：暗渡陈仓的共产党人.....	119
第三节 野渡横舟：两极之中的党派和知识分子.....	135

第四章 经济民族主义的勃起	150
---------------------	-----

第一节 两个口号：从“商战”到“实业救国”.....	151
第二节 运动形式：抵制外货和收回利权.....	162

DI17/30

第三节	一个论争不休的老话题：外资当引不当引	178
第五章	文化民族主义的律动	197
第一节	青苹之末的消息	198
第二节	惊涛拍岸的回响	208
第三节	风潮深处的涌动	226
第四节	百壑来会的奔流	247
第五节	漫泻神州的洪滔	262
余论	不尽长江滚滚来	280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考	
后 记		295

绪论 大风起兮云飞扬

——顺应世界大潮的东方激流

自从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华民族面临频频而至的民族危机，不得不起而应变。于是，神州大地上明起暗涌的政治风潮，悲壮惨烈的民族战争，波谲云诡的经济竞争，观念各异的文化冲撞……交替并兴，此去彼来。

在时作时新急剧变换的近代中国历史画卷中，林立的主义和泛滥的思潮，也纷纷呈身示相。它们似乎应验了龚自珍当初“九州生气恃风雷”和“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呼求。而其中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联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民族主义思潮，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使无数的中华儿女沾被润泽沐浴泳翔其间，共兴重振中华之心。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几乎就是爱国主义的孪生姐妹，就是它的代名词。可以说，在近代中国，许许多多风采照人的历史人物由它作育造化而闻名，许许多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因它酝酿陶铸而发生，而多姿多态的思想文化领域也随处都有它的呼号、呐喊。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思潮是近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一个强光点，也是摄取并折射那个时代雷电风云的一面聚光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思潮因其漫长的流程和广阔的流域，它几乎就是一部浓缩别裁了的中国近代史或思想政治史。

然而，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族”，都不是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中国古代文献中，对“民”和“族”二词虽均有所阐述，如以“民”泛指被治的庶人（《诗·大雅·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以“族”泛指危难与共同抗外患的一群人（《说文》：“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族，从矢。”“族”为旌旗，“矢”为弓矢。“族”即在同一旗帜指挥下集矢对外），或泛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左传·僖公十年》“民不祀非族”，可说是“民”与“族”二字同时出现的最早记录。至于合成“民族”和“民族主义”，却是近人从日文中借引过来的。据考证，“民族”一词最早被梁启超引用于《东籍月旦》一文中。在这篇1899年发表的文章中，出现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不久，进入20世纪后，“民族主义”一词被留日学生广泛使用，频频出现于著译之中，成为一个习见的常用名词。

所谓民族主义，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个人对本民族的一种自我体认。也有人把它视为可以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在不同历史条件和阶级内容下，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统治民族或强大民族同被统治民族或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固然不一，而压迫阶级同被压迫阶级的民族主义也常呈差异。

在中国，“民族”一词虽然阅世不久，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却早已栉风沐雨生息繁衍于神州大地，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自我体认或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也是源远流长兴替不衰。

象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身创世的神话一样，中国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也久为先民所称道。至于具体回答中华民族始莫何时，却是一件相当困难之事。据近代研究中国古史的

学者比较审慎的看法，大抵以为新石器时代可视为中华民族莫始阶段。在考订诸多传说史料后，他们认为当时各地氏族林立，经过长期兼并融合，逐渐形成势力较强的三大集团。一为西方的炎黄集团，以炎帝、黄帝为代表，出于西部陕甘黄土高原，后顺黄河东进，分布华北一带，为后来华夏族的本源。二为东方的风偃集团，即太皞（风姓）、少皞（嬴姓，嬴同偃）之后裔，以蚩尤为代表，散布于淮、泗、河、洛之东方平原，为后来东夷诸族所在。三为南方的苗蛮集团，主要分布于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这三大集团由于自身的历史活动，次第交会冲突，继东西两系接触后，稍晚又有南北冲突。在传说中，西方炎、黄二族相竞相争，经阪泉大战和随后几次激战之后，炎帝战败，黄帝成为盟主。在炎、黄二族进一步融合过程中，又联手对付以蚩尤为首的东夷集团，涿鹿一战擒杀蚩尤，黄帝威震天下，东西两集团的融合从此大为开展。苗蛮集团因地处偏徼，与东西两系的接触较晚，大致在尧、舜南征苗蛮之后，开始有较大规模的接触，待到春秋、战国期间沟通达到一定水平。

经由频繁战争和经济的发展，中原诸族不断加强血统和文化的联系，并鼓其蓬勃健壮的历史活力向外膨胀，扩展实力。而周边各族也各以自身的实力不断叩击中原的大门，试图入主这一理想的栖息之地。这样，就在彼此长期冲突交融过程中，到秦汉之际，一个强大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为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汉民族共同体，终于演变蜕化而出。此后，汉民族又继续在与周边各族长期的冲突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同化，遂缔成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最早当可追溯到春秋时代。当时中央势力削弱，戎狄频频入侵，至周幽王为犬戎杀害，华戎冲突达到高潮。华夏既愤怒于戎狄物质及精神等水平的低下，又欲提高自身优越自觉，于是遂有“德华善戎”观念产生，并有所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和“我闻用夏变夷者，

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政治原则确立,“尊王攘夷”也就被制定为华夏的共同目标和民族政策。

这种观念和政策深入人心后,遂上升为理论化。孔子修成《春秋》,“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成为华夏公认的民族主义准则。以为四裔之夷,若不“谋”“乱”而与华夏和平共处,则可以“忠信”“笃敬”的态度对待之,否则即流血相攻亦不惜。到得《公羊传》中,这层意思更被进一步衍发为“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内者,亲近团结之谓,外者,摈斥疏远之谓。从此之后,华夏与四裔诸族的关系均以此作为衡断的准则。

长期以来,这一以“内夏外夷”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基本内容的民族主义观念,其所以在中国根深蒂固深入人心,除了历代汉族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加以强化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人文地理和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加以推求。

中华大地雄据东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东南濒临浩瀚的太平洋,西北屏障高山,北温带宜人的气候,黄河长江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发育成长准备了一个理想的活动场所。中华古代文化的总体水平长期以来高于周边地区的情况,又使得中国人习惯于把自身活动的区域视为唯一拥有高度文明的“化内之区”,而把周边及远方称为教化不及的粗鄙的“化外之地”。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经长期积淀,形成一种“世界中心”意识。以“中国”自称并视域外诸国为“草昧之邦”或“蕞尔小国”,最能表明中国人这种强烈的信念。

与此同时,汉民族文明虽较周边民族发达,但在应付对方武力侵袭时,却常有力不能支的情况产生。如果说,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直到明代,一再耗费巨额人力和物力构筑修缮万里长城,是致力于建造一道汉民族自卫自存的民族屏障,那么,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以维系社会成员血缘纽带为职志的儒家伦理——政治观念体系,便构成中华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成为统合民族凝聚

力的理论基础。对民族的挚情虽然总是同对君上和朝廷的忠诚难以分解，但是讲求民族气节和民族大义，以抵御外侮时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为人生至德，数千年来却一直成为民族优良传统。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长期成为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地理的、经济的和社会观念方面的种种隔绝机制，又使它成为一种比较闭塞狭隘的民族主义，同近代民族主义有着明显的分野。

二

近代民族主义起源于近代民族运动。它是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之后，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扫清自身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曾积极担当本国民族运动的领导任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发展本国资本主义，也必定要致力于民族运动。这两类民族运动都是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温床。

如若从17世纪算起，绵亘数世纪的世界民族建国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一部世界近代史，荦荦诸多重大事件，几乎莫不与之有关。17世纪英国清教徒革命是历史上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也是资产阶级民族建国运动初获胜利。而北美独立运动和美国的诞生，则是18世纪民族主义的伟大成功。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更使民族主义登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它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以及有关人权和民权的宣言，广泛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成为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石。进入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更上新的台阶。意大利从30年代到60年代经过反对奥、法和罗马教皇的三次战争，赢得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德国在60年代到70年代经过三

次对外民族战争(1864年德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1870—1871年普法战争),也取得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

但在上述欧洲民族主义生成发展过程中,一种适应殖民扩张需要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亦即种族主义思潮也曾流行一时,泛滥全欧,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记录。

最先应世并最有名的极端民族主义当推沙文主义。该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它由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征服计划而得名。沙文主义鼓吹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宣扬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主张以暴力建立大法兰西帝国,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由此,沙文主义成为拿破仑向外扩张的理想工具,加重加深了欧洲各民族人民的灾难。

继之而起并与之对应的则是大日耳曼民族主义。一个名叫约瑟夫·阿瑟·德·戈平瑙伯爵(?—1882)的法国人和一个名叫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1855—1927)的英国人,都对日耳曼民族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他们分别于19世纪的中叶和末叶出版了题为《人种不平等论》和《十九世纪的基础》二书。这两部洋洋巨著极力宣扬日耳曼民族是白种人也是地球上所有人种中最优秀最高贵的一支,因此,日耳曼民族有权做世界的主人。这一理论适应了急剧膨胀的德国容克-资产阶级向外侵略扩张的愿望,所以它们相继使得两名德国元首为之倾倒。在前是第二帝国的威廉二世,在后是第三帝国的希特勒。他们共同借助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煽动点燃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浩劫。至今,有关“优秀”民族有权从弱小民族手中夺取“生存空间”的各种变形变相的理论,仍是扰得这个世界不得安宁的原因之一。

随着西方各国殖民扩张活动的展开,它们也就由独立解放的民族变为宗主国压迫民族。世界各地受欺凌国家和民族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于是乃有另一类型的近代民族主义兴起。

在亚洲,近代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勃兴。1857—

1859年轰轰烈烈的印度大起义，1851—1864年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同时并兴，都以强烈的民族情绪作为一大特色。60年代在日本发生的明治维新运动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标明了自身民族运动的特征。而朝鲜、越南、缅甸、菲律宾、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在不久之后都爆发了反抗殖民侵略的民族斗争。在非洲，19世纪后半叶民族运动也呈居高不下的态势。70年代初有阿尔及利亚民族大起义，80年代则有埃及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领导的民族战争，由马赫迪领导的苏丹人民大起义，在南非则有祖鲁人和布尔人的武装反抗。此外，在西非、中非和东非，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斗争始终不断。

进入20世纪后，世界上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越加分明。后者强烈要求摆脱外来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打破了沙皇俄国的民族牢笼。中欧和东欧的民族主义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向前，在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废墟上建立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民族国家。在亚州和非州，则涌现了如中国的孙中山、印度的甘地、土耳其的凯末尔、埃及的扎格卢勒和阿拉伯的伊本·沙特等一批民族运动的领袖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运动风起云涌，再度造成了民族主义在全世界兴盛一时的黄金时代。1945年联合国成立伊始，即密切关注殖民地问题。《联合国宪章》以承认人民的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第十五届大会进一步通过《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宣言》。自此以后，殖民地独立蔚为风潮。这种情况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尤为突出。据统计，1945年前该地区的独立国家，亚太地区为7个，西亚地区为9个，非洲地区仅4个。从战后截至1981年初，亚太地区增加23个，西亚地区增加12个，非洲则增加高达50个。这许多新兴国家的密集出现，清楚表明几个世

纪汹涌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的退潮和全球民族主义的高涨。

应该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既与世界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桴鼓相应，互为犄角，也与欧美诸国勃兴的社会主义运动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在浩浩荡荡向前发展的世界进步潮流中，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正是其中一条支流。

对于这一点，当年中国的先进人物就已有所见及。1903年春，有人在《浙江潮》上发表《民族主义论》，专就理论上和历史上对世界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作过认真探讨。文章强调指出：“民族主义者，十九世纪之产物，而亦其主人翁也。维也纳会议成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大过渡，及法国第二革命起，而全欧之机大动，而奥意战，而德奥战，而奥匈战，而德法战，而东方问题，而爱尔兰自治。及其将终，而英阿之役，美西之役，日本之维新，义和团扰乱，落落诸大事，无一非由是民族主义者磅礴冲击而成。故一部十九世纪史，即所谓民族主义发达史可也。”此文虽然未能剖分欧亚两洲两类不同性质的民族运动，并且亚洲部分过于简略而非洲部分根本未提。但是，文章将欧洲民族主义发展过程区划为胚胎时代、过渡时代、成立时代和膨胀时代四期，确指18世纪末为欧洲“民族主义发动时代，而演其本题于十九世纪”，肯定19世纪末为亚洲“民族主义发动时代，而演其本题于二十世纪”，这就从总体上概括了世界民族主义大潮“乘风破浪”由欧入亚的发展趋势，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民族主义思潮的嬗代接应轨迹，准确预言20世纪亚洲民族主义的勃兴，则不失为一种清醒之论。

大千世界本来就是无量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组成的宏大系统。对于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也应作如是观，即应把它们当作一个子系统来观照。在这里，经典作家关于近代中国民族运动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内在联系的一段论述值得注意，它体现了一种宏观而深刻的辩证思想。1853年，太平天国革

命爆发不久，马克思就指出：“可以大胆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场面：中国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动乱，但西方列强则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①马克思在此所预言的那种“奇怪的场面”，后来果然出现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不断推进其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的事业，而中国人民不可阻遏的民族运动则在西方世界中引起纷争和“动乱”。

三

在对抗西方列强在华建立殖民“秩序”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主义思想相应发生变化，呈现极为明显的新陈代谢应时而进的状态。于是，鸦片战争后，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生成和发展的广阔图景中，存在一个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互相交接同时并存的阶段。在此阶段，以下几项历史因素的影响被清晰地投射其上。

其一，传统民族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产生过积极作用，也在近代拒绝外来侵略过程中发挥过正面影响。但在外力压迫越来越严重的形势下，它日益显得短绌难支，无能为力，必须重新改造制作，方能适应需要。统治阶级要想退据民族壁垒负隅抵抗，或是从事器械（师夷制夷）或外交（以夷制夷）上的改革，都是无济大局之举。近代民族主义的生成，只有坚决走出华夏中心主义的幻境，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协同革新、联手并进方能有济，而其中尤以政治和经济的革新为两大基础。没有这样的社会协同变革，缺乏相应的政治经济基础，近代民族主义就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页。

以健康发展。

其二，有清一代的满汉民族关系，一直是国内政治的焦点问题。在清季，业已变化了的满汉关系仍然直接影响到民族主义，造成一种三角格局。对待西方列强，满族统治者始则自居天朝上国和中华上族的尊崇地位，而称对方为“虏”和“夷”。但在国内反对力量（无论其为太平天国革命农民或是辛亥革命党人）面前，他们仍处于“虏”和“夷”的地位，备受挞伐。为了应付来自内外的压力，当政者不得不在与西方列强周旋同时，全力压制汉族的排满主义，提倡满汉一体，以求缓和满汉矛盾。与此相应，反对力量也必须同时在两条民族战线上作战，外抗汹汹而来的西方民族，内反高高在上的满洲统治民族。这一特定的三角政治格局，给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增添了许多丰富复杂的内容。

其三，外来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巨大冲击，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具有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为了救亡图存，近代有识之士在寻求种种应变方略时，曾全力引进西方诸多物质和精神产品。其中尤以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新成果，如进化论思想、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政法、财经、文教诸方面的新学理最受欢迎。纷至沓来的西方新思想新学理之水，不但直接为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注入了新内容，同时也有效地润泽灌溉了其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步幅渐次加快加大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一股有声有色奔流于神州大地的时代思潮。在这里，当年一位亲历者就“时代思潮”所发表的议论，十分值得一读：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竭。凡‘思’非皆能成‘潮’；

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这是梁启超晚年所作《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的开卷之语。梁氏以自身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推涛作浪呼风唤雨的丰富经历，高度浓缩并概括了有关“时代思潮”的若干要旨。返观汇为激流浪峰迭起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几乎完全可以移用上述梁氏所论。一种思想只要掌握了群众，它的力量就不容低估。一旦这种思想积汇而成思潮，则其掌握群众之更加持久深刻，其力量之更加雄厚伟大，自不难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不是静止孤立的常态思想的堆积，而是一股动态的积渐而来的非常态思想的融合；不是少数人的意志所能支配的涓涓细流或一池春水，而是广泛集合群众共同意愿汇成的洪流。尽管其中广泛包罗各色观念各种支流，彼此分合不定，但它仍然作为一种权威观念，对广大中国人民造成一种巨大的思想信仰。